

面對《中國大趨勢》： 『親共』還是『端共』的新思維

【佳作·葉俞亨】

前言：

關於中國的面貌，很少人是從中立的觀點來看；而且一旦對中國的面貌有了一種成見，這個看法就會越來越強化。孫觀漢先生常說，一個球，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邊的人，說它是白球，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黑球，他們都沒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。南部社會的問題顯然更危險峻，因為大部分的人根本連去看看都沒有。

20 世紀後段開始，談經濟發展、談社會改革、談政黨政治、談政府改造、談文化重建、談人權運動，中國都是個大趨勢。大陸總理溫家寶說的貼切：「中國有 13 億人口，一個很小的問題，乘以 13 億，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；一個很大的總量，除以 13 億，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。」關於中國大陸，我想說的是，不論你喜不喜歡這個「龐然大物」請先試著了解他，才能對他有所應對。爲了你，也爲了你的下一代，這是不得不的嚴肅課題。

本篇心得的作者並無真知灼見，也沒辦法給你中國的全貌。只是一個在地南部人閱讀《中國大趨勢》的一些感想、一些感動，化作力量、也化作行動，甚至親自走訪了中國，希望可以補充本書的部分內涵並和大家分享實際的中國體驗。

壹、思想的解放

思想解放無疑是當代中國崛起的根本動能，本書第一章

（支柱1）旨在闡明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，其重要性可見一番。然而，書中內容只見皮毛，未能深入淺出，稍嫌可惜。其實當代中國至少經歷了3次思想解放，其過程驚心動魄、其故事發人省思、其結局改變了中國並且影響了世界。

一、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¹

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可分三個主時期，第一階段是1978年戰勝「兩個凡是」，所謂的兩個凡是即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，我們都堅決維護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。」本階段思想解放衝破對於「個人的崇拜」，實踐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。

第二階段則在1992年破除姓「社」姓「資」的迷思，解放前「社會主義」與「資本主義」被嚴格的區分，成為階級鬥爭最具殺傷力的工具。1990年10月5日北京某大報發表〈關於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兩個問題〉即說：「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公有制的經濟，因而必然要求實行計畫經濟。計畫經濟即從總體上自覺實行有計畫、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，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，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。」；同年12月17日在一篇名為〈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〉的文章則又說：「市場經濟，就是取消公有制，這就是說，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，搞資本主義。」這種氛圍下的社會，任何改革的提案或意見總會問問究竟是姓「社」還是姓「資」，一個不小心就勞改去了，不免讓人懷疑共產黨改革的決心，是不是又要走回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路線。直到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鄭重的發表

¹ 本節改寫自：馬立誠、凌志軍（1998），《交鋒—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》，台北：天下文化。

演說：「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，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。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，資本主義也有計畫；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。兩者都是經濟手段。」才又使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站穩了步伐，向前邁步。

第三階段著眼於姓「公」姓「私」的解放，也就是「公有制」與「私有制」之爭。到了1997年，江澤民的「五·二九」講話，才解除了姓「公」與姓「私」的束縛。從理論的層面來總結三次思想解，可引用鄧小平的一句話，「警惕右，但主要是在防止『左』」。

二、解放後的中國

「思想枷鎖」是統治者為政權鞏固的殘酷手段，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元凶。「思想的解放」則是放鬆「教條主義」的嚴格控管，讓人民以「實事求是」的態度，用科學的方法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，思想的解放可以說是一切社會動力的基本動能。

1949年到1976年間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把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國，化成灰濛濛的一片，死亡、飢餓、流離、逃難與鬥爭幾乎是中國的全部。人民的思想被徹底的綑綁，很難想像中國人民是如何熬過那些艱苦的歲月，文獻上會永遠記載著這悲慘的一頁。

只是實際與對岸人民交談過後，驚訝地發現，歷史的苦楚對他們是那麼的輕微。他們普遍的認為把精力投入追求未來的美好生活，比沈緬過去更為有用。就如同我一開始所說，我無法給予中國全貌，但這樣樂觀進取的社會氛圍，相當程度描繪了中國在解放後的普遍景況，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願意回國奉獻。他們常說：「在美國我可以開創一個事業，但是在中國我可以參

與創造歷史²。」我自己感受是，臺灣很久沒有這樣的社會氛圍了。對此，我感到十分的憂慮。

貳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

中國，人口眾多，地域遼闊、發展極度不均衡、組織疊床架屋，政府機構的層次共有「五級半」（包括十幾個副省級）³。如此複雜的組織層級，資訊不完全、不對稱自是難免。過度專政集權與資源壟斷，也導致中央政府「高高在上」，而地方政府卻是「天高皇帝遠」，形成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」的官僚政府。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」，就是在思索既有困境的解決之道。

一、烏托邦的想像

多美麗的一幅字畫，看得令人心曠神怡，充滿想像，彷彿伊甸園世界的真實到來：

演進中由上而下的「政府指導」，與由下而上的「公民發起」的互動，正在塑造一個新的政治模式，我們稱之為「垂直式民主」。這是一個以信賴為基礎的體系，政府相信人民，人民信賴政府。這樣的模式適合中國歷史、中國人思維與和諧關係，隨者中共未來越成多元面貌，帶有成見的反對者也將減少⁴。

上述引文大致就是原作者本章的核心，大意是說，

² 約翰奈思比（John Naisbitt）、桃樂絲奈思比（Doris Nasibitt），侯秀琴譯，《中國大趨勢——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》（CHINA, S Megatrends: 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），台北：天下遠見，2009，頁38。

³ 胡鞍鋼、鄒一龍（2010），《紅色中國綠色錢潮——十二五規劃的大翻轉》，台北：天下雜誌，頁167。

⁴ 同註2，頁53以下。

幾千年來中國受到自上而下的嚴格封建式獨裁統治，自下而上的力量受到壓抑。到了 1978 年改革開放後，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出現根本的變化。位處上層政府，逐漸能夠聽取人民的意見，並將部分政策的參與權下放給基層的人民；人民也更加積極參與各項政策的訂定，逐漸懂得如何追求自己的權利。政府自上而下釋放權利的同時，人民也自下而上提出適當的要求，產生一種極為完善的應對與配合，於是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共產黨的執政，反對的意見也會越來越少。

共產黨的轉型與進步，世人皆知。只是作者做出如此簡化且過於樂觀地政治描繪，視乎是被中國經濟上的成就所蒙蔽，以為經濟上的成就，必然驅動政府成功轉型；經濟條件是驅動政府改革的必要條件，而非充分條件。於是我認為，中國政府現在只是剛始進入轉型階段，作者對於共產黨的描繪其實過於美好，如果世界上存在一個這樣的政治體制，能與社會這般的和諧互動，它的名字一定叫作「烏托邦」。

二、不同形態的民主

我們的社會經常以為「民主等於選舉」、「民主等於投票」，就如《當中國統治世界》作者馬丁賈克（Martin Jacques）所言：「西方世界觀察中國實的致命盲點在於心態的作祟，因為美國的全球霸權已經長達一輩子，西方的整體優越則已經持續了好幾輩子，我們早已習慣西方甚至美國主宰的世界，因此很難想像別的世界。」於是迷信民主的只有一種形態，那就是「選票」。江澤民曾經接受訪問如下：

江澤民在 2000 年 9 月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（CBS Television）的華勒斯（Mike Wallace）專

訪，當時華勒斯問到江澤民對民主的了解：「為什麼美國人可以選舉他們的國家領導人，但是你顯然不放心讓中國人選舉國家領導人？」

「我也是選出來的領導人，只是我們的選舉制度不同。」江澤民反駁「每個國家都應該有自己的制度，因為美國與中國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傳統，以及不同的教育與經濟發展水平⁵。」

顯然，江澤民認為其領導地位是具有民主正當性的，只是方式與西方國家不同。事實上，中國的領導人從來不是用西方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，而是從政績取得合法性；中國並非由總理或主席作獨裁式的領導，實際上那是一種「集體領導」制度。這個職務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，採任期制，此與西方國家並無不同。只是並非由全國人民直接投票產生，好處是領導人可以為國家做出宏遠的規劃，不用為了贏取選票，制定短視近利的政策；缺點是關於公共政策的形成，人民並沒有太多的直接參與。關於這點，我一直存有疑問。號稱民主的臺灣，除了例行的「投票」我們真正參與了多少公共事務，又或者對那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，又瞭解了多少？

簡單來說，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」談的是共產黨由專橫獨斷的獨裁政體，逐漸開放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的過程。換句話說，以往政府由上而下的進行社會控管與規劃已不復見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下對上的民眾參加及公民治理，讓地方或民間依照自身所需，參與公共事務或訂定公共政策。需要澄清的是，這裡所提的「上對下」或「下對上」的關係，都是相對性的，

⁵ 同註 2，頁 57。

它不是一種絕對關係。其所強調的只是，共產黨正逐步放鬆管制，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新的時局和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，謹慎地，做出合宜的調整。調和政府「有形之手」與市場「無形之手」。2009年2月2日溫家寶在英國康橋大學演講《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》亦明白的指出：「在金融市場上市場配置、政府和社會監管『兩手都要硬、兩手同時發揮作用』，才能實現按照市場規律配置之源，才能使資源配置合理、協調、公平、可持續⁶。」

我個人則認為，下對上的人民參與是全世界的趨勢，中國已經無法置身於外。不過可以預見的未來，自上而下的影響力仍然遠高於自下而上的互動。我也同意政大經濟系教授林祖嘉的看法：「中國人尊重法統的觀念根深柢固存在大多數人的心中⁷」。因此，作者過於樂觀地描繪，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對應關係，短期內恐難實現。

參、圍地造林讓樹木自由成長

一、中『鴛鴦』中國的社會主義

什麼是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？在中國，它幾乎等於在談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。1979年11月26日，鄧小平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時說：「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，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，這肯定是不正確的；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⁸。」這算是中國領導階層最早將社會主義納入市場經濟內容的談話。一直到了1992年1月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豐富了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」的內涵，也才真正被社會主流所接受。簡單

⁶ 同註3，頁178。

⁷ 同註2，頁X。

⁸ 同註1，頁132。

來說，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就是在破除教條主義的迷失，不論名稱上稱做「資本主義」或者「社會主義」都同時具有「計畫」與「市場」的內涵，兩者都是為社會謀福祉的工具，政府則要不斷的依中國的社會條件，宏觀調節計畫與市場的功能。可別以為，這看似理所當然的事。在當時的中國，因為「教條主義」社會氛圍，無數人被批鬥或因此命喪黃泉。

本書作者說的含蓄，「30年前的中國就像一座巨大森林，林中的樹木都必須長成同一個樣子；只要是破壞群體一致性的植物都會被砍掉或拔除」。直接說，就是當時中國相互鬥爭，一片死寂。為了讓意識形態的辯論消音，鄧小平雖然力推思想的解放，卻重申中國堅守社會主義的旗幟。看似矛盾的立論，其實充滿了智慧，「畢竟對許多中國人來說，毛澤東譴責資本主義的話語，還言猶在耳。」這是避免社會持續衝突及內耗，而且負責任的政治語言。

當然，也有不少外國人揶揄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一點都沒有特色，它就是典型資本主義國家，逐漸走向市場、開放與現代化的必經過程。故弄玄虛的在名稱上做了包裝，無非只是掩耳盜鈴，「鴛鴦」中國而已。

現在我們已經明白，管制與市場本是個相對概念。它是國家因應當時社會所需，給予不同程度的管制或自由，如此而已。意識形態之爭，實非各理論之本意。為求公平，乾脆也給號稱自由市場的美國，叫做具有「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」，誰叫它也不純粹，居然還敢制定一大堆莫名的規定。

二、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的危機

中國在20年間所達成的各項成就已無庸置疑，特別

是 2008 年金融海嘯襲捲全球時，扛起穩定世界的要角，儼然是中國崛起的最好證明。然而社會疾速發展的下場，卻也產生許多的後遺症。誠如臺大經濟系林建甫教授所說：「中國的社會由於舊秩序正在消失，新秩序尚未建立，所以中國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複雜、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⁹」。所得分配嚴重不均是當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，按照學者王小魯的研究指出，中國最高收入 10% 的居民和最低收入 10% 的居民，人均收入並非官方公布的 23 倍，而應該是 65 倍，情況可說想當險峻¹⁰。因此對內一定要以追求「和諧社會」為首要；也由於全球化的結果，導致臺灣及全世界已經相當倚賴中國。以 2011 年 8 月 5 日《聯合晚報》頭版標題「全球股災」為例，「大陸上證」下跌 50.52 點（-1.88%），同日「美國道瓊」則下跌 512.76 點（-4.31%），受連帶影響的臺灣則下跌 461.14 點（-5.58%），創下後金融海嘯的最大跌幅。也就是說，台股市值一天縮水愈 1.24 兆，相當於 2,300 萬國人平均當天財產損失 5.39 萬。按照經濟學家的說法是，「只要中國的經濟成長持續低於 8%，就是嚴重的社會威脅¹¹。」換句話說，我們該擔心不是中國的持續發展，而是它停止成長。

三、樹木「自由成長」與「隨便亂長」

「圍地造林」就是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，將該區域內的限制條件降到最小，以便吸引資金、人才或發展技

⁹ 馬丁賈克（Martin），李隆生、張逸安譯，《當中國統治世界》（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），台北：聯經出版，2010，頁 16。

¹⁰ 同註 3，頁 122。

¹¹ 經濟成長率影響所及，包括環境承載、社會穩定、資源排擠等。太高或太低，都不利於中國持續發展。一般認為經濟成長率 7.5%-10% 最為合適。詳如註 3，頁 188 以下。

術。目的就是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，也就所謂的讓樹木「自由成長」。希望透過特定地區的先行富裕，進而帶領其他地區的繁榮發展。具體的內容則是在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和海南省等設立「經濟特區」。

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於，中國已經長年存在的「吃大鍋飯」與「平均主義」的心態。當時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劉田夫說¹²：「…廣東如果這樣搞，那得在邊界上拉起 7,000 公里長的鐵絲網，把廣東與毗鄰幾省隔離開來。」顯見反彈聲浪之巨以及推動特區的艱難。時至今日，雖然當時政策及部分園區並未成功。但總體來說，中國將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，轉變成為市場經濟與地方分權的過程仍屬順利。如今，中國的國民經濟超過三分之二是私有制度所創造¹³，這也驗證英國哲學家亞瑟楊（Arthur Young）所言：「The magic of property turns sand into gold.」意思是說，「財產權（私有制）的魔術，可以點石成金。」

讓樹木「自由成長」，初步獲得經濟上的成效以後，立即面臨許多面向的挑戰。當中最嚴重的問題包括，貧富差距的快速擴大，例如最富有的省份國民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省份的 10 倍¹⁴；國家富裕之後人民依舊貧窮，由圖（一）即可看出隨著中國快速的富有，人民的財富提升並無同比例提升¹⁵；土地進行開發導致可耕地不足，「糧食危機」的可能性大幅提高。「中國只擁有全世界可耕作土地的 8%，但必須養活全球 22% 的人口；相對於

¹² 同註 1，頁 9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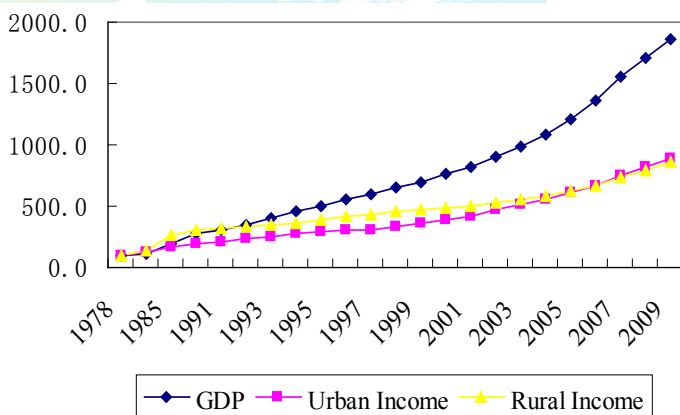
¹³ 同註 2，頁 101。

¹⁴ 同註 15，頁 209。

¹⁵ 藍色曲線表示國家的 GDP，黃色及粉紅色曲線表示人民財產的 GDP。圖形顯示，兩者雖然都向上延伸，差距卻也同時擴大，代表國家富裕了，但人民貧困依舊。

美國，美國只有中國五分之一的人口，可耕作面積卻是中國的三倍大¹⁶；其他如衛生醫療、社會救助、環境災害等問題都是「樹木自由成長」衍生的問題。學者更是認為，中國若無法成功轉型，即可能進入「中等收入陷阱」，屆時社會矛盾會更為嚴重¹⁷。

「圍地造林讓樹木自由成長」只是國家發展的初始階段。真正的挑戰在於，各項各項問題逐漸凸顯後，國家如何運用宏觀的調節，讓樹木「自由成長」而不是「隨便亂長」，兩者往往只是一線之隔。國家介入也必須相當的謹慎，計畫、管制和自由市場本是「雙面刃刀」，畢竟水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。



GDP指數與居民收入指數圖

資料來源：常修澤（2011）。「十二五」經濟發展轉型研究。
北京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報告，未出版。

肆、摸著石頭過河

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思維，目標非常的清楚，

¹⁶ 同註 15，頁 210。

¹⁷ 胡鞍鋼（2008），「廣東發展模式轉型與金融危機應對」，《國情報告》，第 35 期。

那就是到達河的對岸。但是我不知道途中會遭遇什麼困難，只能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試，沿著石頭，腳踏實地的摸索；我也不知道有沒有「捷徑」，但我願意一步步向前。本書作者則說：

摸著石頭過河是個隱喻，反映出中國領導班子展開新中國抱持的態度。僵化的方向和目標不再，這個心態讓整個國家能找出自己的道路，透過試驗、不斷摸索、勇於冒險尋找可能辦法，並且從「實事求是」的過程找到最好的方法¹⁸。

一、『石頭』大觀園

「石頭」只是個比喻，意味著前方路途各式的挑戰與不確定。「經濟大石」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首先遭遇的問題，目標是「解放生產力」。試辦經濟特區獲得初步成功後，國企又是另一難題。1984年，時年35歲的幹部張瑞敏奉派至一家國企，後來他回憶說¹⁹，「當年上午8點開工，9點就有人陸續開溜，到了10點你往廠子丟顆手榴彈也傷不到一個人」。而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是在牆上張貼布告：「請不要在工廠隨地大小便」。到了現在，我們已經不再質疑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為中國帶來多麼鉅大的成效。

中國正在起步，途中會遭遇「政治石頭」、「溝通石頭」、「法治石頭」、「制度石頭」、「媒體石頭」等，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摸索。我們無法對中國何時到達彼岸給予正確的時間，這比較像是永恆運動，如同一種持續進步的現代化歷程。美國外交官關係委員會的亞洲研究中心

¹⁸ 同註2，頁107。

¹⁹ 同註2，頁115。

主任易明（Elizabeth C.Economy）則說，中國媒體在政策上「精神分裂」，因為它「進進退退，測試界線，明知他們需要新聞自由，也需要新聞界提供訊息，但卻擔心一旦打開大門釋出這種自由，可能危及政權穩定²⁰」。中國正是如此反覆測試，「摸著石頭過河」。

伍、藝術與學術的發酵

思想的解放帶來人的解放，引領社會的步伐，藝術家與知識份子總是率先跨出。本書作者則說：

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是最早不受規則與限制所束縛的人，他們打開心智，勇於想像與幻想。創造力獲得釋放時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永遠都是開路先鋒，由於有了他們，整個國家的水準得以提升²¹。

關於藝術，我寧願相信那是一種性靈上的純粹，源自於自我感受的追求，或者隱於內，或者顯於外。北京一位藝術家張曉剛說：「藝術應該是表達個人的性格，我總覺得，藝術首先是個人的，然後才是公眾的。」也是藝術家的毛旭輝則認為，「藝術是生命本生的體會，它不會說教，只是喚醒人們。」

從較廣義的觀點出發，藝術在人類出現時，就已經邁開了它的腳步。因為「人類源自潛意識的最基本思想與情感，多以意象而非文字表現出來」。食物及繁衍是最原始的藝術內涵，其他的型態陸續被發展出來、建築、音樂、舞蹈、雕塑、電影等其他更複雜的藝術被持續的發展出來。或許我們可以說，藝術存在我們的意識與潛意識裡，透過生活的實際感受，被人們發展出來。它也許是身體上的精練、心靈上的

²⁰ 同註2，頁124。

²¹ 同註2，頁177。

啓迪或者是技術上的提升；它是主觀的感受，也有客觀的和理性的一面。好比再多人讚賞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，也會有人毫無感受，這就是主觀；任何建築設計都需要考量當代技術與結構的可行，否則那只是一幅「建築畫作」，這就是藝術的客觀層面。

藝術與學術既然都是驅動社會提升的火車頭，政府就該營造良善的環境供藝術家及學術人員能夠自由的創作，並且建置適當的平台供普羅大眾可以觀賞或體驗這些作品。試想，電影人製作出來的影片，如果沒有放映的場所，人民如何分享這些藝術。按照本書提供的資料，「在中國，平均每 50 萬人分享一個電影銀幕，在美國是 8,000 人，許多中小型城市連一個戲院都沒有²²。」臺灣或許較無播映場所不足的問題，但是其他的藝術空間、創作資源是否充足，是大家必須持續關心的議題。

陸、融入世界

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翌日，胡錦濤致電歐巴馬：「中美兩國在事關人類福祉的一系列問題上，擁有共同的利益，肩負著重要的共同責任。……」；歐巴馬總統則在任命洪博培出任駐華大使時說：「我想不出比建立我們兩國之間的橋樑更加重要的任命了，這些橋樑不但會決定美國人與中國人的福祉，還會決定世界的未來²³。」

本書作者亦提供相當多的數據，說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關聯，經濟與能源的獲取更是如此。以 2008 年李明博與溫家寶會晤為例，兩國即簽訂 263 億美元互惠外匯協議；同樣是 2008 年中非計畫，將投資總額由 20 億美元增加到 50 億

²² 同註 2，頁 163。

²³ 同註 2，頁 186。

美元；自 2009 年 4 月起，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，其對拉丁美洲的貿易總額更超過 1,400 億美元²⁴。種種的資料皆在顯示，中國與世界的關聯越趨密切，它將如何融入世界或者影響世界，自然是大家關切的議題。

一、「百年之恥」新中國

中國富裕之後，對於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會更具信心，在世界上各個領域也會擁有更多的「話語權」。因此，可以預見的未來是，中國的影響將不會只是在經濟方面，它的政治與文化將更具影響力。

2010 年 3 月中旬美國《新聞週刊》一篇文章的標題為：「這是中國的世界，我們只不過寄居其中。」看起來誇大又聳動，卻也凸顯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崛起的格外重視。有關中國崛起後的各種揣測，報導、專刊、書籍之多，何止「汗牛充棟」。我個人無意再增添一筆，只從中國的優越傳統、輝煌歷史，到近代「南京條約」所開啓的「百年之恥」，最後重回世界列強的歷史循環，作情感上的抒發。對於中國崛起的結果是，「中國越來越像西方、西方越來越像中國、世界中國論、中國世界論、中國威脅論、中國崩潰論等」並不作出斷論。

中國的苦難超過了一世紀以上，直到 1978 年第一次思想解放開始，歷經 30 年的努力，終於再回到泱泱大國的歷史格局，深藏在潛意識裡的優越感才又被喚醒。如同中國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所說：

中國崛起是上天註定的。中國人對自己在人類文明史上取得早期成就頗為自豪。在過去兩千年裡，中國數次成為世界超級大國，比如在漢代、唐代以及

²⁴ 同註 2，頁 195。

清初……中國在歷史上的超級大國地位一方面讓中國人極其自豪，另一方面也讓中國人對中國目前的地位深表痛心。他們不相信，中國的沒落是歷史的錯誤，所以他們應當更正這個錯誤。……中國人認為，中國崛起只不過是中國重獲它應有的國際地位，並不是得到什麼新東西²⁵。

然而，近代中國太過苦澀、太過卑微，又源自於一種上古歷史的優越，導致許多中國人的性格相當兩極。有臺灣魯迅之稱的已故作家柏楊，在《醜陋的中國人》一書，將中國人描述如下：

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，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的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的其他人都是狗屎，不屑一顧；變成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²⁶。

這種說法，相當程度捕捉了「羞辱的世紀」對中國心理的影響。我則認為，這或多或少受封建思想的荼毒，導致一種單元主義的認同。當國家富強時，整個民族意識高漲，極度高傲；「百年之恥」就讓整個民族陷入極度的卑微，這是一種集體心理防衛機制，其實內心相當脆弱，只能尋求魯迅式的「精神勝利法」，阿Q精神至此發揚光大。

四時遞嬗，歷史更迭，所有興盛、衰敗、輝煌、羞辱的過去都是中國的寶藏。西方的現代化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標準，中國卻有悠久的歷史養分可以反芻，只要

²⁵ 同註4，頁320-321。

²⁶ 柏楊（2011），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台北：遠流出版，頁30。

它不重蹈覆轍。西方的人權、法制、平等、自由與市場機制並非普世典範，卻是全人類持續追求更大福祉的重要參考點。隨著中國的日漸富裕，對於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也變得更有信心，可能不太願意再去模仿西方。好處是，西方自以為是的典範將獲得更好的修正；缺點是，中國的驕縱可能破壞了世界的和諧。畢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，引領世界太久了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疑慮不難理解。一方面希望中國善盡大國的世界義務；二來則是擔憂既有的利益受中國瓜分。

中國如何融入世界？這個問題太大，或許從過去歷史推論中國沒有海上擴權的傳統，可讓世界各國較為放心；如果中國仍依循「克己復禮」的儒家傳統，態度上、行為上自然願意和世界共同面對環境、金融、人口、氣候、資源、核武、恐怖攻擊等全球性問題，我們自然有理由相信「全球化的世界」與「崛起的中國」並不會衝突，也會樂觀的相信「同一個世界，同一個夢想」，不會只是北京奧運呼喊的口號；怕的是，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稍微有一點成就，就過度膨脹，走回歷史這條舊路。

柒、自由與公平

關於「自由」與「公平」這項哲學上的難題，自古迄今，論者無數。從來沒有人講得清楚，充其量是在尋求更為普世的共同價值²⁷；「資本主義」與「社會主義」也從來不是區分「自由」與「公平」的本質，卻都是以追求「人類共善」為目的。換句話說，「自由與公平」、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」都只是手段，目的則是「人類共善」。以往有人認為「社

²⁷ 我個人比較相信，只有地域性的共同價值，沒有普世的共同價值。

會主義」與「資本主義」的辯論焦點，在於「自由」與「公平」之爭，豈不成爲「手段」解釋「手段」；「手段」的目標還是「手段」的大怪哉。

我們要以「實事求是」的態度，針對社會上各種制度，分別探討它的公平與自由。而非給兩個「空箱」，將所有東西分成兩類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），硬是塞到裡面，想像會有多少東西變成了怪樣。教條式的主義，畢竟不是人，不懂被「裝箱」的酸甜苦辣，於是我們要摒棄它。

一、誰的自由？誰的公平？

「公平」與「自由」沒有一套舉世皆宜的標準。無論怎麼定義公平，都會對一些人產生不公平；無論怎麼定義自由，就會有人自由受到限制。中國民國憲法第 23 條不就規定，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可以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嗎？換句話說，「公平」與「自由」都是相對性的概念。它受到教育、文化、天賦、信仰等因素的影響，公平與自由的界定，難免存在主觀判斷（縱使個人已經盡可能的保持客觀），於是我們都得承認，所謂公平與自由不能是單一標準的。誰的公平？誰的自由？總有不同的答案，我們只是從中學會彼此尊重。

我個人比較欣賞英國哲學家邊沁（Bentham）在《自由論》一書對自由的界定，「只要不礙到別人，人人都有爲所欲爲的自由」簡潔扼要，界定清楚。偉大的思想家及經濟學家的彌爾（Mill）後來發展出「個人權利至上論」，內容豪邁奔放又無傷大雅，也是我所激賞的：

個人只有在影響到他人的時候，才需要對社會給個交代。只要不礙到任何人，我的「獨立自主是一種絕對權力。一個人對自我，我對自己的身與心，都

具有無上的權利²⁸。」

「公平」的界定與「自由」的探討同樣困難，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（Rawls）在《正義論》一書中，以「無知之幕」（veil of ignorance）作為思辨的基準，相當值得參考。他說，「假設在平等的初始狀況，大家聚集起來寫一份社會契約，也就是集體生活的規範原則。由於大家不知道自己的性別、種族、膚色、健康、天賦、宗教信仰、政治偏好，也沒有任何的階級之分，相當是在「無知之幕」之後作出選擇。等於是在平等的初始狀況作選擇，沒有人有任何的談判優勢，這樣協商下的制度就能實踐平等²⁹」。

我對公平的信念，就是建立在「無知之幕」後，使社會「立足點」盡可能的平等。讓人們只要願意努力，就能擁有充分的機會，可從社會底層向上爬升；讓先天上有所不足的人，都能獲得充分的支援。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二、自由的疆界

如果你認為中國人並不自由，那麼下段文獻是最好的證據。

1776年7月2日美國正式宣告獨立。決議文中寫道：「茲決議：合眾殖民地（United Colonies）為，亦應是，自由獨立之國家，其免除自身對不列顛王室之擁戴；其與大不列顛國之一切政治聯繫為，亦應是，徹底無效。」；235年後，中國仍然沒有作出自由宣言；在臺

²⁸ 我麥可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，樂為良譯，《正義一場思辨之旅》（JUSTICE —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?），台北市：雅言文化，2011，頁58。

²⁹ 朱敬一（2010），《朱敬一講社會科學：社會科學的源起背景》，台北市：時報文化，頁139以下。

灣，居住遷徙自由、表見自由、秘密通訊自由、宗教自由、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的保障，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的保障，已有 65 年之久³⁰。中國至今，仍未將自由納入憲法加以保障。

真實情況卻非如此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的自由權利，可能超過許多人的認知。「自由」是相對性概念，多數人早已認同。「自由的疆界」在於個人的權利推廣至極，並以不影響他人自由為前提。於是限制個人自由，最具正當性的理由叫作「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」。張海花（Helen Zhang）與杰夫貝克（Geoff Baker）所著《像中國人一樣思考》一書舉的例子³¹：

……杰夫參加一個商務午宴，他坐在一個聰明伶俐，受過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商人旁邊，她所獲的財富甚至超她父母大膽的想像。杰夫問她是不是覺得自由，她說：「當然」；她可買任何她喜歡的東西，自由地去她喜歡的地方旅行，可以和任何人做生意。杰夫再問如果她不能夠隨意隨意去遊行示威，如何感到自由。她不可置信地看著杰夫說：「究竟為什麼有人會想這樣做呢？！」

這個對話非常有趣，又具代表性。因為我親自到訪、親眼所見的中國都市，確實如此朝氣蓬勃³²。從這段對話，似乎可以感受到成功女商人享受「自由的愉悅」。他們接下來的對答，卻特別耐人尋味，「究竟為什麼有人會想這樣做呢？」這句話是探討「自由的疆界」最好的題材。

³⁰ 部分自由權利是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後，人民才真正擁有。

³¹ 同註 7，頁 42。

³² 這裡是故意簡化避談中國大陸城鄉差距，因為那又是另一個重大議題。

理由之一，人民可憑自己意願界定自由。「自由之於個人，如同陶土之於巧手」，個人為「主體」，自由只是「客體」；個人憑藉巧手（主觀價值），捏造屬於自己的自由。也就是說，「自由是不拘任何形式的，直到它妨礙了別人的自由」。中國人看待自由的方式，深受「儒家」與「法家」思想的影響。社會面，受教於孔孟學說，特別強調「秩序」與「和諧」；政治面，長年的封建統治，乃至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，均受韓非用「法」與用「勢」的治國理念所影響，所以相當程度上，中國是一個重視「法統」的國家。於是就有學者認為，「中國人相信，秩序不會壓迫自由，反而界定了活動的空間」。就像一場球賽，必須要制定規則，遵守規則，球員才能盡情發揮；同樣地，有秩序的社會，才能為人民界定真正自由的活動空間³³。如果秩序與法統已是中國人價值體下的「原生自由」，他們憑藉自己的意願，界定出屬於自己的自由，西方世界沒有理由不尊重。

理由之二，政府的管制必須要有正當性。在中國，隨意的進行示威遊行，是不被允許的。理由就是，你上了街頭，制造紛亂，壞了秩序，也就妨礙他人享受和諧社會的自由，於是政府要限制上街遊行的自由，這就是「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」的典型。人們必定質疑，為何英美等先進國家的人民，能夠擁有集會遊行的自由。

這是因為，英美等國的自由發展早於中國數百年之久，它們的自由程度也是漸進開放的，畢竟自由與管制分寸的拿捏並不容易。中國歷史上，欠缺理性公民所發起的街頭運動，人民走上街頭通常是以暴亂收場；再以中國 1978 年改革開放至今，不過 30 餘年，經驗仍然

³³ 同註 2，頁 54。

相當缺乏，因此示威遊行容易觸動政府敏感的神經。其實，隨著人民智識水平的提高，走上街頭已經不再是暴亂的代稱，而是人民對於某項政策的理性訴求。「每一次和平或成功的街頭運動，都在降低政府管制的正當性」，香港是絕佳案例，中國也正在學習。當人民走上街頭，不再明顯妨礙他人自由時，政府就該學會放手，讓人民自由。

三、公平的遐想

「公平之所以迷人，是由於它無法完全實現」，所以我稱它作「公平的遐想」。因為心中存在一份遐想，所以願意繼續實現。按照羅爾斯的概念，如果社會上有個「無知之幕」，在那幕後，人人皆不知自己的社會地位、長處短處、價值觀、人生目的，當然就不讓任何人利用優勢，自覺或不自覺地，發展出較有利自己的條件。「均貧富」不會是大家所追求的，因為大家終會發現，只要在制度上做出妥適的安排，彌補因為隨機因素所造成的不公平（出生、天賦等），允許「差異」能帶來社會更大的好處。舉例來說，如果社會上認為，醫生的待遇比司機好，那麼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，讓弱勢的人也能透過努力成為醫生，會比而壓抑他人天賦更有實益。公平更不是讓大家均貧富，而是提供充足的機會，讓最底層的人，仍然可以透過努力，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從這個角度出發，鄧小平在 1986 年接受一家西方電視台訪問時說，「社會主義的原則，第一是發展生產力，第二是共同富裕³⁴……」就顯得相當不務實。或許當時的中國，正需

³⁴ 同註 1，頁 206。

要能夠凝聚共同夢想的口號；或許……。

法諺有云：「等者，等之；不等者，不等之。」即是「差異原則」思維下的產物。一個簡單案例，「辦公室男女各 50 人，爲了公平起見，男女廁所會各有 3 間。於是排隊等待上廁所，成爲女生每天的例行工作」。很少人知道，這是忽略『差異原則』所導致的問題；男女生理結構不同，女生上廁所本來就需要比較多的時間。公平要處理的是，解決個人因爲先天因素，所導致的劣勢；就上廁所這件事來說，女生需要花費的時間比男生多，卻只擁有和男生一樣的廁所數量，其實就是一種先天上的劣勢。正視「差異原則」，才能讓整個社會更接近公平。

教育是落實公平的具體作爲，也惟有教育方能使公平的遐想更具實現之可能，於是各國政府無不重視之。胡錦濤在 2007 年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及：「必須保障經濟困難家庭、近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。」；

2007 年，大連民工子女在公立學校的人數占全體學生的 3.2%，到了 2008 年，則升至 17.3%；2008 年 1 月，上海浦東新區宣布設立 4 間，共可招收 3,900 位民工子女的學校，並給予部分補助³⁵。

諸如此類的政策，其實還有很多。遺憾的是，中國教育離公平的距離仍遠。根據 2011 年 8 月 8 日《聯合新聞網》一篇名爲『成績是錢堆出來的 貧寒學子難翻身』的報導指出³⁶：

學者楊東平的研究顯示，以湖北省為例，2002 至 2007 年 5 年間，考取專科的農村學生比例從 39% 提

³⁵ 同註 2，頁 222。

³⁶ 同聯合報導（2011，8 月 8 日）。（成績是錢堆出來的，貧寒學子難翻身）。（聯合新聞網）。2011 年 8 月 8 日取自 <http://udn.com/NEWS/MAINLAND/MAIN2/6513265.shtml>。

高到62%，以軍事、師範等方向為主的提前批次錄取的比例亦從33%升至57%。而在重點高校，中產家庭、官員、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、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；武漢大學副教授尚重生認為，「寒門再難出貴子」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。寒門學子社會關係匱乏，也不利於他們的發展。尚重生擔憂的表示，未來「貧二代」越來越多，社會斷裂，貧富矛盾增多，不利於社會安定。

這是嚴重的社會警訊。因為，社會原本存在許多的不公平，教育則扮演扭轉劣勢的關鍵。按理說，一個公平的社會不該如此，因為教育的功能之一，就是使得社會階層能夠輪動。如果連教育都存在過大的不公平，那麼公平的遐想，將永無實現之可能。

四、中國人的公平觀

本書之末，作者特別提及「中國人認為我們生來都是有關連的」。並且引用張海花與杰夫貝克所著《像中國人一樣思考》書中的內容：「西方人或許相信，人人生而平等；而中國人則相信，人人生而相互關聯³⁷。」

嚴格地說，我並不覺得這是關於公平的主要議題，倒像在探討中國人的行為模式。大多數的中國人或臺灣人，也許不太明瞭那些西方作家的用詞，但其實這些內涵，一直在你我之間，被視為理所當然。西方作者所說「人人相互關聯」，道地的解讀其實叫作「找關係」。有一句我們都熟悉的諺語：「有關係，就沒關係；沒關係，就有關係」。意思是說，有了關係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；沒了關係，只好公事公辦，其他的等長官交代再辦。至

³⁷ 同註7，頁22。

於怎麼找關係，家庭、族群、學校、老師、朋友、同事與主管，中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到彼此的牽連；2009年11月14日，連戰代表臺灣參加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」（APEC）領袖音樂會之夜，據說「連戰與歐巴馬碰面時即說，歐巴馬的舅公（外祖母的弟弟）與他是舊識，並都曾在芝加哥大學就讀，隨即與之搭肩閒聊十分鐘之久³⁸。」堪稱近年來，「找關係」的經典之作。

職是之故，在中國，如果有人真的將「事」與「人」作單獨考量，意味著他很難獲得成功，於是我們經常運用不同管道在「找關係」。只是從社會進步與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，費事耗力的「相互關聯」是不是一件好事，就值得再作考量了。

捌、目標諾貝爾獎的創新之路

150年前，美國曾經是知識產權的最大盜取者，他們拿歐洲的技術和知識，壯大自己的國家並促進經濟繁榮；30年前，臺灣從「仿冒王國」一度成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首；中國走的正是『山寨』這條路，它當然可能複製別人的成就，成為「創新王國」。

硬體設施的完善是成為「創新王國」的必要條件，軟體方面則是創新的充分條件，如人才與文化等。硬體方面，中國已經投入相當多的經費建置高科技園區，技術創新區、生物醫學區、科研教育區，並在各頂大學設立創新育成中心，將最新理論與業界技術即時結合；軟體方面，中國目前每年產生90萬名主修科學、工程與管理的大學畢業生。此外，還有為數眾多的中國學生在美國頂尖大學念書。據說在矽谷的

³⁸ 陳嘉惠、林郁仁（2009，11月15日）。〈APEC/領袖夜 連戰、歐巴馬搭肩閒聊〉。（今日新聞網）。2011年8月12日取自 <http://udn.com/NEWS/MAINLAND/MAIN2/6513265.shtml>。

專業技術人才中，中國就占了約三分之一，近年則有越來越多人選擇回到中國發展³⁹；根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，截止至 2009 年底累積的國內外發明專利已達 58.66 萬件，而且在 2005 至 2009 年間以平均 25.1% 的速度增長⁴⁰。

中國政府則宣稱，現在大約有 3,800 萬名研究員及科學人員，當中將近 1 萬名是屬全球前幾名的頂尖專家⁴¹；此外，中國教育部在 2010 年 3 月 22 日公布一個數據，在華學習的留學生人數，遍及 190 個國家與地區，總數已經突破 23 萬人，預定 2020 年將達到 50 萬人⁴²，其對文化的衝擊與創意的激發，具有相當正向的意義。

然而中國偏重記憶與紀律的教育養成，可能會妨礙學生對於創新體驗。特別是在中國的農村，教育揹著一整代教師舊有思想的沈重包袱，他們多半墨守成規，特別重視考試分數，這對創新並無好處；另外一個不利創新的因素，則是社會的文化。中國人過於重視面子，難以接受失敗及批評，於是瀰漫著「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」的文化氛圍，這種心態恐怕短時間也是難以調整。

總結而言，中國正朝著創新國度努力與邁進，由他們的十二五規劃亦可窺得而知⁴³。然而，經濟上已經獲得初步成就的中國，社會、文化與教育等則尚顯不足，邁向「創新王國」仍路途遙遠。畢竟「行百里者半九十」，步步為營，持續向前，方有實踐之可能。

³⁹ 同註 15，頁 219。

⁴⁰ 同註 3，頁 137。

⁴¹ 同註 2，頁 238

⁴² 同註 3，頁 73。

⁴³ 陳十二五規劃就是大陸的五年計畫，從 1953 年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起算。類似臺灣早期的「四年經濟計劃」、「五年經濟計劃」、乃至於「六年國家建設」。因為達成率非常高，十一五期間達成率甚至超過 9 成，故世界各國均非常重視這項指標，並從中理解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
玖、『親共』還是『踹共』

『踹共』是一個流行用語，意思是台語的「出來講」。講什麼？當然是講道理。所以「踹共是一種公民的美德」，就是要你出來講道理。面對「中國大趨勢」，心態上該如何因應，我們相邀一起「踹共」

南臺灣很多鄉下，仍然保有傳統的美德，就是大家有事沒事會聚在街頭巷坊的「亭仔腳」、廟口或古樹下閒聊，談古說今，兼論國家大事，目的當然是聯絡感情。

當中其實夾雜許多，說三道四、道聽塗說、似是而非的事。而社會上存在一種現象，「一個人說，是假的；兩個人說，懷疑是不是假的；一群人說，它就是真的」。這種信以為真的「集體意識」，支配個人的感覺、思維與行為模式。簡單說，就是個人失去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，於是大家只能跟著說、跟著做。這種「從眾行為」，也很像經濟學上講的「羊群效應」，這是在講一隻無知、迷迷糊糊，卻位居領導地位的羊。有一天在懸崖邊吃草，不小心掉了下去，成群的羊也傻呼呼地跟著往下跳。現實生活中，「地方樁腳」到蠻像那隻領頭的羊。

真正恐怖的是，南臺灣長年瀰漫著「集體意識」，大家靠著講相同的事，尋求彼此的認同，其實已經不太能夠接納不同的聲音。部分能夠理性思辨的智者，也大都不願意講出真話，畢竟「明哲保身」，免得招人非議。曾幾何時，講真話等同是「口出諱言」的同義詞。按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認定，一個國家大家都敢說真話，「民無諱言」，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。反過來說，若人人都「諱莫如深」，就是社會黑暗的證明。有一則笑話這樣說⁴⁴：

⁴⁴ 李敖（2000），《獨白下的傳統》，新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頁14。

五代十國的時候，有一個號稱「長樂老」的大臣，叫做馮道，他又字「可道」。曾經當上太師一職。據說有一天，他的學生讀「老子」這部書，一開頭是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因為「道」是馮道的名，「可道」是他的字，學生避諱直接叫老師的名字，所以碰到「道」和「可道」，就念成不敢說，於是這兩句，就念成了「不敢說」「不敢說」，非常「不敢說」。

「非常不敢說」，成了南臺灣的大問題。常常一句「都是阿共的陰謀」，就可以輕易地使南部民眾「情緒喚起」。在這裡，一個聰明理性的人，總是知道「沈默是金」；一個愚昧的人，總是不加思索的從眾。「踹共」就是要大家好好出來講，學習思辨、學習尊重、學習表達、學習溝通，培養自己成為理性自律的公民。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多元民主，能夠理性思辨、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。

誰在『親共』？

我沒有任何的黨派和政治色彩，也自認是個好人，但有個大缺點，就是天生擁有一條敏感的「親共」與「不親共」分類神經。倒也沒有特別喜歡或討厭中國，但只要有人提到中國，就會觸動那敏感的分類神經，讓我總是不自覺的猜測和我談話的人是「親共」還是「不親共」；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都喝了「濁水溪」的水，南臺灣，很多人和我一樣有這條敏感的神經，他們大都是好人，卻喜歡作「親共」與「不親共」的分類。

我不太習慣花時間思考、蒐集不同資料、作理性的辯證。如果偶然發現與大家觀點不同的事實，我會選擇不說，或騙自己從沒發現，畢竟多說無益；關於這些，南臺灣，很多人跟我一樣。

最近看了一些資料，發現幾項與大家所說不太一樣的事

實，想和大家分享。一本書上提及，中國第一次成為臺灣的貿易夥伴是在 1979 年，至今約有 5 萬家臺灣公司在中國生產商品，與大陸成為合夥關係的企業則約有 10 萬家，總投資金額已達 500 億美元⁴⁵。我感到相當的震驚，由於那條敏感的分類神經，又讓我不自覺地想到，這跟「藍」「綠」有沒有關係。因為我們這裡的人，把「藍」「綠」簡單的歸類為「親共」與「不親共」；進一步的蒐集資料發現，「藍」營執政的 2010 核准大陸來臺投資共計 79 件，總金額為 94,345 百萬美元。同年台商對大陸投資共計 914 件，總金額為 14,617.87 百萬美元；再來看看「綠」營執政的 2007 年，台商對大陸投資共計 996 件，總金額為 9,970.55 百萬美元，一樣是可觀的數字⁴⁶。我開始懷疑，多年來「藍」「綠」在政治上「故作姿態」與中國惡臉相向，實際中國與臺灣經濟整合已有很長的時間，社會、文化與對岸的交流早已相當平凡。

現在我終於知道，此時不用再質疑中國的對臺動機，畢竟『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』，就像不用問『強盜』想對你幹嘛。現實就是，就算你不喜歡「強盜」的動機，他也不會放過你；所以，面對『阿共』的崛起，我們要親它、哄它、拱它、騙它、拐它、接近它、安撫它、擁抱它，我們要趁勢壯大自己，再來決定要不要踹開它。文末，我僅提醒自己，面對全球都很重視的「中國大趨勢」，不要只談誰在「親共」，也要學習「踹共」。

⁴⁵ 同註 2，頁 267。

⁴⁶ 資料來源：行政院陸委會，《兩岸經濟統計月報》，第 220 期（2011 年 6 月），<http://www.mac.gov.tw/ct.asp?xItem=96985&ctNode=5720&mp=1>



國家文官學院